



中国文化论坛

余永定 主编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与未来

余永定 主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 / 余永定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
(中国文化论坛)
ISBN 978-7-108-03764-0

I. ①中… II. ①余… III. ①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国 IV. ①X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717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8.5

字 数 273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2.00元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 2004 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关切和思考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

政治、法律、教育、学术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近一百年前，年轻的鲁迅这样写道：“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一百多年来，在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and 实践中反复回旋的不正是这一持久的关怀吗？事实上，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论坛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理事会将根据具体主题确定负责该年度论坛组织工作的主席人选，并协助他做好论坛的各项准备工作；每届论坛的主题由理事会和顾问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并深入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论坛将根据不同的主题，邀请知识界的同道，展开深入的、跨学科的讨论，力求突出思想文化的内涵，提出前瞻性的问题，并在每届年度论坛结束后编辑出版相关主题的论文集和其他出版物。

序

杜维明

这至少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文化论坛了，每一次都感觉受益良多。这次我收到李学军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看到这个报告集，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这是太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就把其他所有安排放弃，就是想来聆听的。既然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想就把我的一些感想提出来，和大家分享。

2009年下半年，当时德国的总统在他的官邸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只邀请了十五位哲学家，我没机会参加，但是被邀请的哲学家之一。它的题目是“多种现代性的形态”，这和我所讨论的多种现代性有密切关系。我看到它的大会议程，觉得非常惊讶：第一场提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何为人”，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也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如今在人文学，不仅是哲学，在各个方面对人的存活问题都非常关注，所以在哲学界常常有所谓“对人的重新思考”。在三天之前，语言学家，也是重要的政论家乔姆斯基，在北京大学接受博士学位时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的前提是人类现在碰到两大威胁：一是核战，那是一种一次性崩溃；二是生态破坏，是逐渐的，但是现在到了一个严峻的时期，有人称其为 tipping point，就是说如果这个时期过去了还不解决，接下来就会每况愈下，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有一位生物演化学者，叫 Ernst Mayr，他说人类的发展大概是十万年，脑力越发达的，存活能力越小。人类发展到现在，存活能力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的存活能力比动物、

植物要差得多，比如我们没办法和细菌或者蟑螂相比。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提出来，大家都知道的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然后在斯德哥尔摩开了关于生态环保的会议。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认为这个挑战是全面的，我们要改变的不仅是行为和态度，也是基本的信仰，就是要对“何为人”、“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的问题进行反思。所以我们所面临的课题不能从信息、数据乃至知识来解决，一定要有一种新的人的智慧。这种新的人的智慧当然是碰到生活世界必须改变的大挑战。我们都了解，假如美国或者欧洲不改变，发展中国家改变的效率、力度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一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就进行了一种全世界的博弈，如果把它很明显地说出来，就是你钱给得越少，碳释放得越多，你就越成功。问题在于，如果你是全世界碳释放量最大的国家，虽然在博弈中取得了成功，但是真正受害的还是本国人民。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大问题。

关于人口的问题，中国可能会碰到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假如朱熹（1130 ~ 1200）突然在天安门出现，他最惊讶的可能不是汽车、飞机，而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人在跑来跑去？因为在以前，譬如我研究的一些思想家，陆象山、程颢、王阳明，都是五十多岁就故去了。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中国还没碰到，就是其他所谓先进国家的人口下降的问题，美国是靠移民，否则人口也在下降。再加上贫富不均等各方面的问題，挑战非常严峻。这次的世博会主题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中文翻译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完全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说，你要生活好，你就要接近城市，这里的“城市”当然是指雅典；你要使你的人生有意义，你就要住在雅典。但是我们现在是否有这样的乐观？这是值得大家忧虑的。

我们现在提倡“和谐”，我相信是从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来看的一个重要议题。“和谐”不仅是对内，而且对外，因为中国有“天下”的观念，希望把和谐的理念推广到世界各地。但是这个成效非常有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你要世界和谐，你自己内部能不能和谐？虽然这个议题我们这次会议不提，但是我觉得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和谐和团结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上，这个基本的价

值取向和很多领域有密切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是宗教。马克斯·韦伯曾经讲过，“对宗教来说我是‘音盲’”，但是毫无疑问，韦伯一生的努力就在于了解宗教，了解宗教的社会作用，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我们现在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对宗教基本上是“音盲”，而且掉以轻心，还是把宗教当作迷信，认为通过科学理性能够把宗教的问题消解掉。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对于经济的诱惑、政治的影响乃至军事的镇压，宗教的抗拒力量非常大。在罗马时代，基督教力量非常薄弱，但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几乎是无能为力，你即使把基督教徒送到狮子口里，他也还是不屈服。

从这方面来看，我感觉到我们这次提的几个问题，包括经济的问题、人口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等等，之所以使我受了很大的感动，是因为我们的这一批学者，在做这些分析的时候不是单纯地把它们作为学科对象来研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人文关怀。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论坛具有一个难得的特性，就是这里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都是有人文关怀的。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十三年，我们所要了解的对象就是人文学和对于文化有敏感的社会科学。最近我到北京大学建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我特别用了“人文”而不是“人文学”，“人文学”是文史哲，但是“人文”的范围要宽得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那些不是纯粹地从专业来考虑课题，而确实有人文关怀的学者。我们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是有前瞻性的。

（注：本文系作者在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整理稿）

导 言

余永定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式的。波动、停滞、倒退是常态，而持续稳定增长只是特例。阿瑟·刘易斯曾指出：经济持续增长（按人均产量计）仅属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时期。持续增长的过程始于英国，并在 19 世纪前半期按美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这一顺序扩散。各国在不同时期登上了经济增长的楼梯。在 1870 年以前，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只有六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类国家增加到二十一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增加了十五个。在 1950 年到 1970 年间又增加了二十多个国家。但是，正如刘易斯所说，经济增长是一个登楼梯的过程，各国在不同时期登上楼梯。在楼梯上的国家，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上升，有的下降。也很可能从楼梯上掉下来——增长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停滞了。有的国家则实现了可持续增长。^{〔1〕}事实上，在刘易斯所谓登上了经济增长楼梯的国家名单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从楼梯上掉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稳稳站上可持续增长楼梯的国家和经济体屈指可数。在较为晚近的经济学文献中，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一个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即人年均收入达到 3600 美元之后，如何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OECD 国家）的转变。严格来说，除去德国、日本这样的战败

〔1〕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实现了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国家（经济体）转变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四小龙”）。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世界前列的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则大踏步倒退，直到 1990 年代还是危机不断。在亚洲，一度蒸蒸日上的亚洲“四小虎”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风光不再。“四小虎”之首——泰国则更是陷入严重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具有趋同趋势，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往往难以继续前进，最终实现由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即便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只要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对内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进一步的 growth 就可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原因何在？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种种可能的答案。

-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发展本国的创新能力，技术进步潜力丧失；
- 粗放式经济增长，资源耗竭；
- 环境污染严重，无法继续承载经济发展；
- 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过重；
- 劳动力成本上升，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 既得利益集团坐大，零和博弈使资源配置无法进一步改善；
- 贫富差距过大，阶级分化严重，政治不稳定导致经济停滞；
- 城市化过程受到压抑，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或失去控制，形成大量城市贫民和流亡无产者；
- 依附型发展、过度依赖外需，经不起外部冲击。

经济学中有所谓“路径依赖”问题。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否能够进

人发达国家行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在以往数十年中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出售资源的基础上，一旦资源枯竭，该国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又如，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完全依赖出口，一旦国际市场陷入萧条，该国的发展也就走到了尽头。

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增长模式。经过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 4000 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增长模式是成功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为否定的理解”。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selbstnegation）过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的发展成本正在急剧提高，旧模式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改变增长模式，中国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沿着某一种道路持续增长，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之后，就只能被惯性推动而无选择的自由。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飞跃，中国知识界必须自觉地推动增长的“范式转变”。但是，“真理是具体的”。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面临着哪些严重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在本届论坛上，我们初步设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1）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在给定国际环境下的发展。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中国的国际环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环境。就国际金融环境而言，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又是最为至关重要的。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下的脆弱性。在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的非均衡外向型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经常项目顺差（贸易顺

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积累了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以实际资源换取了越来越多的以美元计价的债权。更为严重的是,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和大批发达国家在形形色色泡沫的影响下,过度消费严重,公私部门都积累起巨额债务。中国和少数经常项目顺差国持续购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国债,对西方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债务不断增长的趋势还将继续。谁将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埋单?随着越来越多发达国家陷入财政困难和国际收支困难,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必然出现国债融资困难。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中国必须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新的更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准备,加快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减少中国可能遭受的福利损失。

(2) 关于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城市化既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又是中国能否平稳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的最大考验。在经济发展史中,城市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农业人口脱离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劳动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从而使经济增长取得重要的推动。然而,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中国也会面临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脱节所产生的边缘化大众(marginal mass)或次无产者(sub-proletariat)等等问题。同城市化过程密不可分的另一问题是“三农”问题,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总额比例超过60%。如果不能成功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及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不但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而且还可能面临严重的社会动荡。

(3) 关于气候问题

气候变暖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世界各国首脑做出了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中国在2006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减少 40% ~ 45%。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仅仅排名 100 位。减排必然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因而，中国必须在减排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适度平衡。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历史责任”原则和“平等”原则，主张按人均累计排放确定减排目标。如何认识气候问题，例如，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担心是否有可靠的科学基础，已经日益引起中国公众的关注。中国应该对气候变暖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何种措施（碳税？碳交易？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捍卫自己的发展权利，而且涉及中国今后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

（4）关于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不仅是农民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如何？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能够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在加入 WTO 之际，经济学家曾对中国农业安全表示过不安。在加入 WTO 十年之后，一方面，中国农业似乎并未出现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听到“中国大豆沦陷”、中国的粮油加工企业纷纷倒闭、种子市场被孟山都控制等等噩耗。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程度是很低的。在同农业发达国家的竞争中，中国农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民以食为天”，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到底如何？中国粮食生产到底是否会遭到外国跨国公司控制？转基因食品问题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的关注甚至不安。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农业科学界对此问题有何不同看法？世界各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有何不同？对这些政策应做何种评价，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策？

（5）关于人口问题

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是决定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对中国人口的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的人口总量、结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将提出何

种挑战？为什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如何未雨绸缪（或亡羊补牢）对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对经济资源配置作某种改变以应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就中、短期来讲，人口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并将进一步造成何种影响？

（6）关于技术创新问题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只有强大的制造能力而没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国就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最惨痛的教训即是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由，放弃和中断了相当多自主开发产品的平台以及相应的技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航天大国，但是寄希望于“技术引进”的一些重要产业，直到最近却依然在原地踏步。亡羊补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才能改变现在的被动地位，迎头赶上？在教育、体制和技术等诸多领域，中国应该做出什么努力才能使中国真正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技术创新而不是粗放的外延式增长上？

（7）重庆个案研究

以某一特定地区为样本，我们可以探讨政府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本书呈现的就是对这七个大问题的研究观点和讨论，希望能给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提供一点启示。

目 录

总序	I
序	杜维明 I
导言	余永定 I

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当代国际货币体系	余永定 3
评论：贺力平 黄益平	9
开放发言和讨论（一）	15

人口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	蔡 昉 21
评论：杨春学 黄 平	38
开放发言和讨论（二）	43

技术创新的战略观

技术创新与发展战略	路 风 53
评论：高世楫 高 梁	70
开放发言和评论（三）	77

粮食问题与国家安全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对策	张晓山 89
---------------------	--------

21 世纪的农业何处去——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

评估谈起	文佳筠	94
评论：黄季焜		120
开放发言和讨论（四）		125

城市化的机会与风险

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温铁军 杨 帅 董筱丹	131
评论：李 铁 王 军		146
开放发言和讨论（五）		150

如何认识全球气候问题

低碳转型的背景与途径——从哥本哈根说起	潘家华	165
“碳政治”：全球化时代的战略抉择	强世功	172
评论：徐晋涛		215
开放发言和讨论（六）		220

重庆个案分析

“重庆经验”进行时：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地票交易促		
城乡统筹发展	崔之元	225
评论：左大培 王 巍		238
开放发言和讨论（七）		245

圆桌讨论

发言人简介		275
出版说明		280

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国经济